

一项基于多民族
聚集省份高校的实证研究

高等教育机会 与 社会阶层

董云川◎著
张建新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一项基于多民族
聚集省份高校的实证研究

高等教育机会 与 社会阶层

董云川◎著
张建新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首次选取来自多民族聚居省份云南 10 所高校的实证调查数据作为剖析样本,回溯了近现代以来云南高等教育的演进脉络,并以云南大学为例追踪呈现 20 世纪中叶以来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通过实证数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验证了与社会阶层及高等教育机会相关的一系列假设,最后针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性、教育因素对于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机会与公平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并有待于进一步深究的命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研究者、行政管理者、攻读高等教育学学位的研究生以及社会学科科研人员和教师的研究与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等教育机会与社会阶层:一项基于多民族边疆省份高校的实证研究/
董云川,张建新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3-021138-5

I. 高… II. ①董…②张… III. 阶层—高等教育—教育权—研究—中国 IV. G6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1248 号

责任编辑:李 敏 刘 鹏 / 责任校对:刘亚琦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鑫联必升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 × 1000)

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插页: 2

印数: 1—1 500 字数: 234 000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序

逐级相随、渐次提升的九十五级台阶通向云南贡院旧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通过科举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真实写照。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且社会流动几乎停滞的封建社会，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应该是个奇迹，它为贫民子弟改变命运、踏上仕途、栖身社会中高层，提供了一个向上流动的阶梯。

在任何社会中，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都要经历某种门槛。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福利制度、社区制度、所有制制度、单位制度、行政制度……一道又一道的门，既是开启流动的通道，也是限制和堵塞社会流动的门槛，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明显减缓，甚至出现凝固的迹象。“你连机会都不给我，还谈什么公平？”这话里，正反映着一种现实：各种人为的门槛，不同程度地从起点上就开始削减人们的各种机会。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潜藏着征服宇宙的热望，但抬头仰望变幻莫测的星空，总是感叹自己薄如蝉翼的思想在浩瀚宇宙中的渺小，总是感到自己柔弱的肩膀在熙攘人群中的微弱。他们抑或对自己的过去和将来长吁短叹，抱怨上天不公，叹息没有优越的家庭和其他的天赋，甚至连搏击的机会也成为奢求。

生命的开始是一个必然的偶然，金碧辉煌还是破檐陋巷，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这种从原始意义上得到的先赋性因素，这种非人为可控制的现象，佛家叫做“缘”。罗尔斯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不平等是人们所处的外在环境和他们各自天生的特点造成的。有些人天生聪慧；有些人天生残障。有些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锦衣玉食，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有些人则在贫困中长大，缺衣少食，求学无缘。这两方面超出个人控制的差异使人们无法站在同一起点上启动人生的旅程，以至在以后的道路上距离越拉越大。难道可以说这是不公平的

吗？仅仅因为它从实际上呈现出群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之间分离的结果，就可以轻易地下这样的结论吗？不尽然。对于这个客观而不可从源头上抑制的因素，规避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只有循着它的足迹去研究，遵循着它的规律去转化，才能使它的弊端减到最小。“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打破框与框之间的界限，需要全社会和每个人来共同努力。

先赋性因素是一个个透明的玻璃罐子，人人身置其中。教育，是开启罐口的手。有人说，教育不像持天平之手，而像是不能两全的滑轮。确实，富裕的人享受富足的教育资源，贫穷的人连教科书都要少几本；优秀的人经过教育可能更加优秀，普通的人经过教育可能依然普通。调整不平等的利器还是可能存续着不同程度上的不平等——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但是，绝对的公平在哪里？

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不同的人们难免陷入相互指责和埋怨之中，袖手看着悲伤的沙粒纷纷落下。与此同时，名为“教育”的拯救天使，曾经多次叩响过“命”和“运”的心门。

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很明显，教育系统是一台庞大的筛选机器，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一把最重要的阶梯。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这台庞大的筛选机器为各个阶层提供了向外和向上竞争的公平阶梯，使人们都能接受自己被安排的位置，并依此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又充当了社会“减压阀”。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兼顾所有人的利益，亦不可能为了虚构的“绝对公平”而减缓前进的脚步。正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最大限度地兼顾全体人民的利益，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达到。

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对于社会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流动的自致性因素，也是最有效地将既存社会模式永久化的手段。科举

时代“学而优则仕”，接受高等教育能使得低阶层人们“鲤鱼跳龙门”。可是现今“新读书无用论”却泛起风潮，“毕业的那天就是失业”的现象也不少见，持有大学文凭的“待业者”越来越多。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民族要想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就必须有一个自由流动的社会机制。向外和向上流动的通道，是对现状不满的泄洪渠道，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教育承载了此项重任。教育是一个让人类的自然属性社会化的过程，当普通的人经过教育变得不再普通、简单的生存欲求能够被自我的理智所约束、能够被一种新的观念所替代时，教育的公平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人的精神达到了自由，所有的领域都会向他开放，他才真正能够如鱼得水般地挣脱先赋性因素的制约。

世间难题不断涌现，药到病除仅只是相对而言。虽然没有“理想国”，但并不妨碍我们坚守理想、追求理想，为实现理想而矢志不渝。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差别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要绝大多数人都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就会充分发挥促进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越是始发于社会弱势阶层的人们，如能获得充足的教育并且接受了越高层次的教育，就越可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状况，继而改变原先的社会角色。“上大学后悔四年，不上大学后悔一辈子”，或许正是那些社会地位不利者在当代矛盾的心声。

置身天地之间，有两样东西能让人类无比敬畏而战栗不已——头顶上的星空和脑海里的道德律令。而此时，人类喋喋不休的所谓“公平”概念，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月光下，云南大学东陆园著名的九十五级台阶，延伸到隐约可见的“仰止楼”，使得我们心中对于高等教育的敬畏感提升到了变幻莫测的星空。

作 者

2007年10月28日凌晨

目 录

序

第一章 命题背景	1
第一节 多民族边疆省份——云南	2
第二节 社会分层	4
第三节 中国社会阶层	9
第四节 中国社会阶层划分阶段	11
第五节 研究设计	23
小结	31
第二章 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阶段的发展历程	32
第一节 云南高等教育历史变迁（清末~20 世纪末）	32
第二节 “十五”期间云南高等教育概况	47
小结	58
第三章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历史轨迹	59
第一节 20 世纪 50 年代初	60
第二节 20 世纪 60 年代初	62
第三节 20 世纪 70 年代初	63
第四节 20 世纪 80 年代初	65
第五节 20 世纪 90 年代初	67
第六节 21 世纪初	69
小结	71
第四章 云南省高校实证研究样本及总体差异	74
第一节 样本描述	74
第二节 总体差异	76
小结	82
第五章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进入学校类型差异	83
第一节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进入同一类型高校差异	83
第二节 同一社会阶层子女进入不同类型高校差异	87
小结	89

第六章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进入不同专业差异	91
第一节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就读专业整体差异	92
第二节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就读不同专业的差异	93
小结	99
第七章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	100
第一节 男女两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100
第二节 不同类型高校中性别差异分析	104
第三节 学科专业选择上的性别差异分析	107
小结	108
第八章 家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差异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110
第一节 家庭文化资本差异	110
第二节 家庭经济资本差异	112
小结	114
第九章 少数民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家庭背景差异	115
第一节 家庭背景差异	115
第二节 影响因素	119
小结	122
第十章 有待检验的理论命题	123
第一节 命题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本研究命题下具有特殊性	123
第二节 命题二：个人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是后致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30
第三节 命题三：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呈现相互影响的关系	136
第四节 命题四：教育机会均等要遵循“平等自由”和“差异”两个公平原则	142
结语	155
参考文献	157
附录	164
附录 1：调查问卷表	164
附录 2：On the Discrepancy i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a Province with most Ethnic Minorities; a Case Study of Universities in Yunnan	168
后记	184

第一章

命题背景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有一个被人们称作“民族大观园”的少数民族聚集省——云南。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红土高原上生活着 5000 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 25 个。其中，云南省独有少数民族 15 个，跨境少数民族 16 个。各少数民族人口合计为 1415.3 万，占云南省总人口的 33.41%，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13.5%。^[1]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云南省在地理位置、多样性民族文化和各种人文资源上具有很大的独特性。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中，云南省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2007 年，云南省共有高等院校 50 所，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 483 029 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gross enrollment ratios）^① 达到 15%，其刚刚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然而，进入高等院校的真正“大众”（农民、工人子女）多数仍然处于边缘，就读于“重点”大学中的“大众”依然不属于少数民族家庭大学生。这虽然与云南省高等教育的历史遗留和形成因素密切有关，但更涉及中国现阶段社会阶层以及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其中的关键词汇之一就是“社会分层”。

追求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对每个社会阶层的个体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性选择目标。在大多数现代国家中，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获得较好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机会的重要机制。高等教育大众化增加了教育机会，那么聚居着众多少数民族的云南省是否也如此？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否实现了不同阶层间的公平？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有着怎样的差异？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和机制如何随之而变化？未来发展的态势又会怎样……

为了便于本书的讨论并不至于宽泛，有必要简述本研究的背景并对几个基本范畴加以界定，并简要介绍研究设计。

① 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97 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1997）》，我国教育部规划司制定的新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公式为：

$$\text{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 \frac{\text{学生总数}}{18 \sim 22 \text{ 岁年龄组人口数}} \times 100\%$$

学生总数 = (研究生 + 普通高校本专科生 + 成人高校本专科 + 军事院校 + 学历文凭考试 + 电大注册视听生注册人数) × 0.3 (折算系数)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 × 5 (系数)。

第一节 多民族边疆省份——云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是非常独特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活的社会发展史之称”。20年来国内学者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且争论颇多,至少可以分为四种类型:①保留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少数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比如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基诺族等;②保留奴隶制残余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比如彝族;③保留封建农奴制的少数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比如藏族;④保留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比如傣族、白族等。^[2]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省的社会分层也就显得非常有特点。我们对1951年云南大学入学学生的家庭背景进行统计,共有36种类型。

民族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的。斯大林说:“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民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也就是说,“民族”的定义有三层内容:①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②民族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③民族具有四个“共同”的基本特征。

云南省是一个边疆省份,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部同缅甸接壤,南部与老挝、越南两国毗邻,边境线从最西北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区开始,直至最东南部的富宁县田蓬区为止,共4000多公里。全省有边境县27个。

云南省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属于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西部为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东部为云贵高原,南部为中、低山宽谷盆地地区,省内多山间盆地和断层湖泊,具有独特的立体型气候。

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全国共有56个民族,云南就有52个,其中,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25个(按人口数量多少排列):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回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景颇族、藏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普米族、蒙古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水族、满族和独龙族(云南省民委和云南统计局2003年6月17日发布)。其中,独有少数民族15个: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和独龙族;跨境少数民族16个:彝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瑶族、景颇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和独龙族。

据2000年11月1日进行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云南省人口共有4235.9

万。按照 1.81% 的漏登率增加各省总人口, 云南省普查时总人口为 4287.9 万。其中汉族人口为 2820.6 万, 占 66.59%, 各少数民族人口合计为 1415.3 万, 占总人口的 33.41%, 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13.5%。^[4]

云南省以“民族多、山多、边境线长”而著称, 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边疆省份, 有四个特点: ①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 25 个, 是全国最多的; ②虽不是少数民族自治区, 但有 37 个民族自治的地方 (8 个自治州、29 个自治县, 见表 1-1 和表 1-2), 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 ③有最具“云南特色”的 15 个独有少数民族, 是全国独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④有分居于不同国家中的同一民族 16 个, 是全国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

表 1-1 云南省少数民族自治州

序号	州名	主体少数民族	成立时间
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傣族	1953 年 1 月 24 日
2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傣族、景颇族	1953 年 7 月 24 日
3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傈僳族	1954 年 8 月 23 日
4	大理白族自治州	白族	1956 年 11 月 22 日
5	迪庆藏族自治州	藏族	1957 年 9 月 13 日
6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哈尼族、彝族	1957 年 11 月 18 日
7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壮族、苗族	1958 年 4 月 5 日
8	楚雄彝族自治州	彝族	1958 年 4 月 15 日

注: 此表按照成立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表 1-2 同。

资料来源: 王声跃、张文等. 云南地理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293.

表 1-2 云南省少数民族自治县

序号	县名	所在市、州	主体少数民族	成立时间
1	峨山彝族自治县	玉溪	彝族	1951 年 5 月 12 日
2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普洱	拉祜族	1953 年 4 月 7 日
3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普洱	哈尼族、彝族	1954 年 5 月 18 日
4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普洱	傣族、拉祜族、佤族	1954 年 6 月 16 日
5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临沧	傣族、佤族	1955 年 10 月 16 日
6	宁蒗彝族自治县	丽江	彝族	1956 年 9 月 20 日
7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怒江	独龙族、怒族	1956 年 10 月 1 日
8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大理	彝族、回族	1956 年 11 月 9 日
9	石林彝族自治县	昆明	彝族	1956 年 12 月 13 日
10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丽江	纳西族	1961 年 4 月 10 日
11	屏边苗族自治县	红河	苗族	1963 年 7 月 1 日

续表

序号	县名	所在市、州	主体少数民族	成立时间
12	河口瑶族自治县	红河	瑶族	1963年7月11日
13	沧源佤族自治县	临沧	佤族	1964年2月28日
14	西盟佤族自治县	普洱	佤族	1965年3月5日
15	南涧彝族自治县	大理	彝族	1965年11月27日
16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普洱	哈尼族	1979年11月28日
17	寻甸回族自治县	昆明	回族	1979年12月20日
18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玉溪	哈尼族、彝族、傣族	1980年11月20日
19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玉溪	彝族、傣族	1980年11月22日
20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迪庆	傈僳族	1985年10月13日
21	漾濞彝族自治县	大理	彝族	1985年11月1日
22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昆明	彝族、苗族	1985年11月25日
23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红河	苗族、瑶族、傣族	1985年12月7日
24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普洱	哈尼族、彝族	1985年12月15日
25	景东彝族自治县	普洱	彝族	1985年12月20日
26	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普洱	彝族、傣族	1985年12月25日
27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临沧	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	1985年12月30日
28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怒江	白族、普米族	1988年5月25日
29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普洱	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1990年5月15日

注：普洱市原名为思茅市。2007年年初，经国务院批准，云南省政府正式发文：自2007年4月8日起，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其下辖的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时更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第二节 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指建立在法律或规则和结构基础上的、已经制度化的、比较持久的社会不平等体系。^[5]也就是说，社会差别最为广泛，当对它予以价值评价时出现不平等，而只有当社会不平等已经形成了结构或制度化以后，才会出现社会分层。当制度化了以后，社会不平等就有了一个被不断生产出来的机制。因此，人们也常常用“结构不平等”（structured inequality）来代替社会分层。

在使用社会分层标准时，很有必要明确区分“差异”（difference）、“不平等”（inequality）和“不公平”（unjustness）等概念。“差异”与“不平等”和“不公平”不是同一概念。有人天生能说会道，有人沉默寡言；有人漂亮，有人丑陋……现代社会中的人是高度异质的，由于能力不同，有差别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平等。否则的话，多劳多得的公正原则就不复存在，而勤劳与懒惰、贡献的大

小都不易把握，甚至在逻辑上会推演出才能与勤劳是制造不平等的社会根源。此外，社会平等与阶层的平等又是不同的概念。社会平等是指人们在发展机会上的平等，而阶层平等是指阶层间差异上的距离。无差异、无分层的社会是没有活力、没有变化、不可思议的社会。个体间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的多样性和社会分层的必然性。社会的不平等或不公正不完全取决于阶层差异的大小，而在于是否存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分配系统和平等的阶层流动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地把社会中的优秀人才选择到较高的阶层中。另外就是由分层所形成的阶层间的内在张力是否会成为阶层间正常流动的内在动力。社会紧张也不仅来自于阶层间的差距，它往往取决于分层的客观评价标准和主观评价标准是否统一，以及人们对自身阶层历史变迁的评价。^[6]

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中，阶级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概念。“阶级”（class）曾是西方国家社会分层理论的基本概念。在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中，这一概念虽然没有获得过准确无误的定义，但是它却构成了其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汉语中的“阶级”一词，本义就是指台阶。列宁曾经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7]可见，阶级的划分是按照一定的社会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作标准的；而阶层的划分还包括人们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政治权力和其他社会因素在内。“阶级”（class）和“阶层”（strata）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它们都是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范畴，都指社会垂直分化产生的各个社会层次以及处于其中的人群。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层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分层，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层必将制约和影响其他各种社会分层现象，忽视阶级分层就不可能真正从本质上把握阶级社会里的社会分层现象。对于阶级和阶层的关系，理论上阶级和阶层并没有从属的逻辑关系。在过去，阶层一般是指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群体或处于不同阶级之间的群体。而现在中国学者更多地使用“阶层”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是为了有别于在政治上“划阶级、定成分”的做法。^[8]

一般意义上，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因而被视为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焦点。从系统视角来看，分层是整个社会结构或系统交织的部分，诸如教育机构等不能从整个系统中割裂开以理解分层现象。尽管我们讨论的焦点是教育，但它也必须涉及社会、家庭、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学校不可能单独导致或解决阶层系统中的问题，因为它只是整个一体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因此，要了解学校在分层过程中的角色，就必须考察社会的发展。

社会分层研究的首要前提是确立社会地位指标体系，即社会分层维度或标准，采用不同的社会地位指标体系进行分层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构。不

同的社会往往有不同的分层中轴,即最核心的分层地位,它决定其他分层地位的获取。如农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土地,占有土地的多少决定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工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资本,社会成员阶层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本及其增值状况;后工业社会的分层中轴则是知识信息,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极大地依赖其知识信息获得的机会和能力。^[9]

关于社会分层的划分标准,学者们有各自的看法。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 Weber)首创社会分层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划分社会层次的重三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声望——文化标准。^[10]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理论,如英国社会学家洛克伍德(D. Lockwood)关于市场地位、劳动地位、身份地位的“三种地位分层论”。社会分层理论有三种主要模式,即对立的功能主义与冲突主义以及折中的协调论。^[11]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戴维斯(Kingsley Davis)和摩尔(Wilbert Moore)为代表的“职业分层论”,认为个人的财富、声望等都有赖于职业,故可通过研究职业声望来识别社会分层现象。^[12]另外,还有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分层功能论”,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等为代表的“分层冲突论”等。

在中国,陆云彬认为要坚持列宁的标准,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或以财产、收入等经济关系来划分阶级、阶层。他还认为,阶层是同一阶级内部由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职业等不同面划分的不同层次,所以认为划分阶层的标准是社会分工、政治地位、职业、收入等。^[13]张宛丽主张坚持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学派中的多元划分标准,如韦伯以财产、声望权力作为分层标准;帕森斯以财富、出身、职业作为分层标准;布劳以资源、能力的获得与分配作为分层标准;达伦多夫以权威权力作为分层标准。她还坚持以利益群体为基本概念的划分标准,即从社会群体四大差别的干群、城乡、体脑、工农的角度,再从社会生产和权力系统中的地位、职业、知识水平三个方面交叉分层。^[14]米加宁、高德想主张以职业位置、单位集团、制度条件、管理权威、技术能力与文凭资格等为分层标准。^[15]此外,对中国社会结构及社会分层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以社会身份作为利益集团的标准;有的主张以权力或权势作为多元标准的一元;有的主张以社会地位为基点,建立反映地位特征的权力、声望、身份、收入及教育五项指标;还有的则以社会资源及其获得机会作为分层标准,并提出以多级指标确定的指标体系,即职业分类、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出身、政治面貌、财产、权力、生活方式、生产社区、社会声望、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虽然中国的阶层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至今在宏观结构分析中还没有提出获得广泛认同的阶层分类框架。^[16]

一般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很难用开放或封闭这样的概念进行简单定性。一

方面,1949年的革命改变了传统封闭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制度优先性”用新的社会机制塑造了社会结构的框架,决定着社会流动的特有机制。同时,转型社会的基本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研究不可能形成稳定和固化的理论形态。

关于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7]

(1)“三分式阶层结构论”。刘祖云认为,所谓三分式阶层结构,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出发,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18]。

(2)“三维论”。季建国认为,“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阶层结构在理论上被表述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二元结构,但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管理阶层,其成员包括转业军人和工人,以及农民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因此,制度化的阶层结构实际上是三维的:管理阶层——干部、工人阶级——工人、农民阶级——农民。^[19]

(3)“三阶级论”。陆云彬认为,中国社会有三个阶级: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阶级之一,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4)“两阶级两阶层论”。陆云彬认为,从社会基本分工这一直接标准出发,中国现阶段有两大阶级和两大阶层,即工人阶级——大机器生产的代表和农民阶级——落后手工生产力的代表;知识分子阶层——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管理者阶层——现代化生产管理的代表,在社会中处于核心的地位。^[20]

(5)“四阶级论”。王汉生、张新祥认为,中国呈现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多种阶级并存的局面。这四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1]

(6)“三阶级与三阶层论”。张宛丽认为,三阶级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个体劳动者阶级。三阶层指知识分子阶层、雇主阶层、管理干部阶层。

(7)“利益群体结构论”。持此观点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存在新崛起的两大利益群体,一是亦工亦农群体,二是企业家群体,它们都是有着自身特点的新型社会群体。^[22]

(8)“十大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论”。陆学艺认为,十大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者阶层。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等级是: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

(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者、失业者、半失业者)。^[23]

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学者们都注意到阶层结构的不稳定性和变动性,社会阶层越来越趋向边缘化和异质化,即不断涌现边缘群体和产生新兴群体。这更有利于社会结构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有利于社会流动的活跃。这也表明社会结构处于转型中,社会群体利益结构呈一种不稳定状态。

关于阶段的界分,其方法与观点也比较多。李强、邓建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7年处于阶级分层阶段;②1957~1978年处于政治分层阶段;③1978年至80年代中期,政治分层又向“客观的阶级结构”回归;④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中国社会出现了贫富差距的大讨论;⑤90年代至今,中国分层研究分析模型具有明显的多元化趋势。

从时间纬度看,陈光金与陆学艺的分期基本吻合。陈光金主要根据时间纬度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流动进行分期。^①他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流动分为五个大的时期:①1949~1956年,社会阶级结构重塑;②1957~1965年,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二元身份等级体系(实为流动限制);③1966~1977年,政治运动或政治因素成为社会流动的主导性原因;④1978~1992年,社会分化与流动模式的初步转换;⑤1992年以来,正常社会流动机制回归与建立,初步确立现代社会阶层的等级位序(十大阶层)^[24]。陆学艺从“检视不同历史时期的代际与代内影响,分析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决定因素”的角度将中国社会流动划分为两大阶段五个时期。1949~1977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又明显形成三个历史时期:①1949~1956年,终结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②1957~1965年,终结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③1966~1977年,终结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8年以来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由两个历史时期组成:1978~1991年,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是改革开放,实施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以后,这一时期开始的重大社会事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5]

① 王春光也认同五次社会流动的分期模式,并进一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把这种分期划分为两种社会流动模式:政治主导型与政策诱致型。

第三节 中国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social strata)是指社会上的一批人享有同等的或类似的社会资源,^[26]即因不同的经济地位、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而形成的不同社会层次。具体划分社会层次的指标一般有:一个特定群体所占有的社会位置;这些群体所具有的社会威望;他们在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权力关系等级;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道德伦理方面的地位;组成群体的个体社会化程度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春秋·穀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汉书·食货志》进一步解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马克思、恩格斯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阶级和阶级划分的理论,他们关于阶级定义的实质就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中国社会学界对阶层结构的分层研究,是随着阶层的变化而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初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20世纪80年代后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两个阶级、三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工商业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到了20世纪90年代,阶层划分的标准更细了,各种分层体系层出不穷。目前,中国对于阶层的划分有多种,但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以职业为主的多元标准(包括收入、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作为划分的基础。

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随着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引入而日益丰富和完善。正如李俊奎所言:“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分层理论发展的所有方面,国际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的不同理论观点和模式,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都有所表现。涉及职业分层和收入分层、转型社会精英替代模式及分层机制变化研究、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教育和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关系研究等。”^[27]199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开展了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调查和研究。课题组对全国十个县市、两个大型工矿企业和一所大学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取得了11 000多个样本与近千份与各类人员的访谈记录。经过充分准备,自2001年6月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按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2个县、市、区,做了6000份问卷调查。2002年,课题组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公布了十大社会阶层(图1-1)。

陆学艺等提出,对当今中国社会群体的阶层划分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他